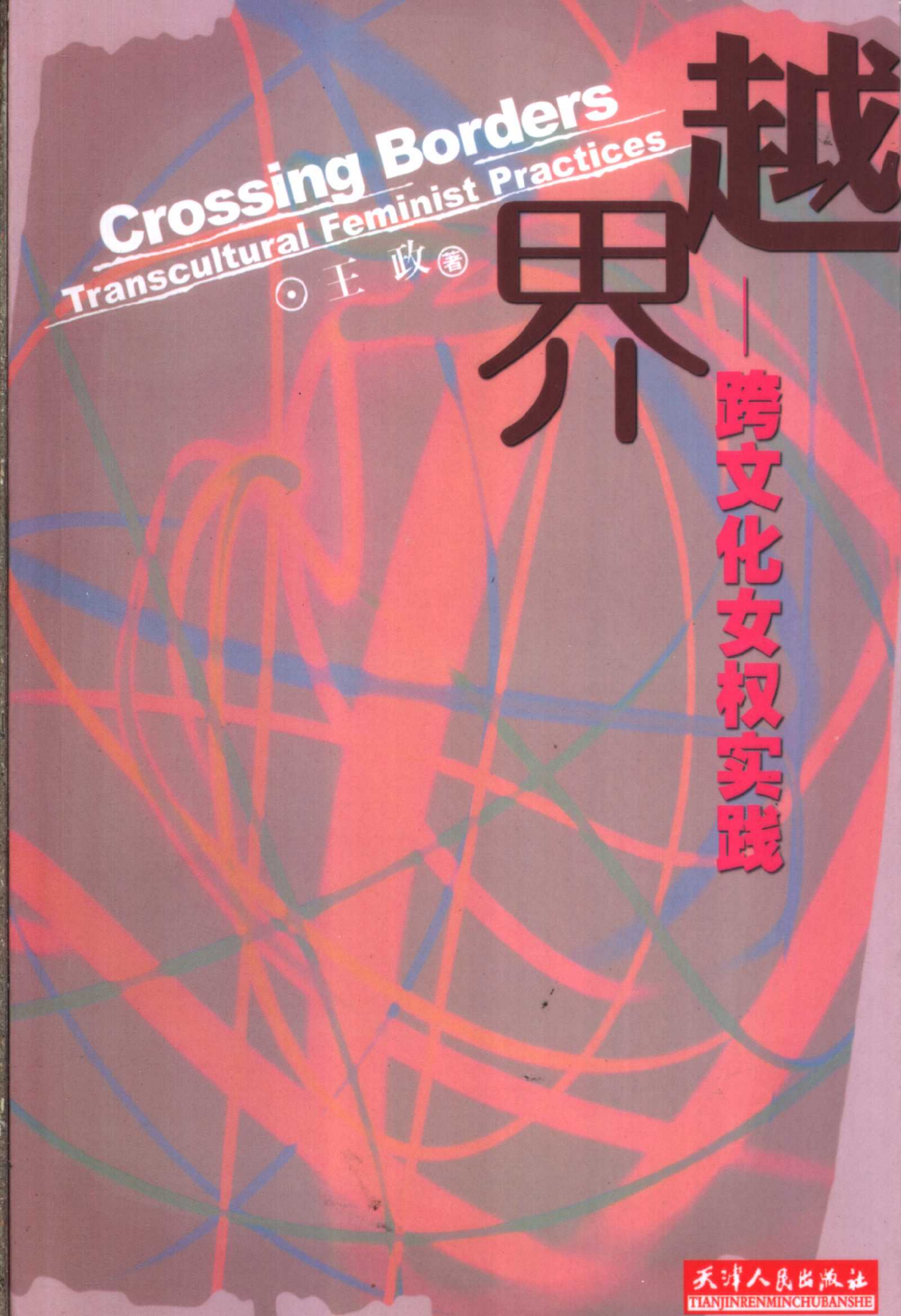




Crossing Borders

Transcultural Feminist Practices

◎ 王 政 著

越界

—
跨文化女权实践

天津人民出版社
TIANJINRENMINCHUBANSHE

越界

——跨文化女权实践

天津人民出版社
TIANJIN RENMIN CHUBANSH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越界:跨文化女权实践 / 王政著. -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4.5

(妇女与社会性别学书系)

ISBN 7-201-04804-X

I. 越… II. 王… III. 女权运动 - 文集
IV. D44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5766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46

网址:<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tjrmehbs@public.tpt.tj.cn

天津市永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7.625 印张 1 插页

字数:170 千字 印数:1-5,000

定价:20.00 元

前 言

对文化两栖者来说,“越界”可能是一种熟悉的体验。跨越国界的旅行虽然有时差和过境手续造成的疲惫和麻烦,却是一种相对轻松的“越界”。跨越文化的界限则艰难得多,因为这意味着对自我的突破和重构。记得1985年秋初次抵达美国,一位同龄美国朋友的父母来机场接我。我以中国小辈对长者的尊敬询问如何称呼他们,二位白发老人毫不迟疑地说,就叫我们的名字好了。这个回答着实让我吃了一惊,从小我家教是对长者甚至不可用“你”“你们”“他”“他们”这类人称代词来指称的,这直呼其名如何使得?!虽然有老人的许可,但看到白发与皱纹便产生的条件反射使我的舌头转不过来,别扭的感觉持续了很长时间。这个不起眼的经历其实是跨越文化界限的开端,以后在异域文化中所经历的无数不适、别扭、困惑都不断促使我去有意识地审视自己的文化界限,去反省在特定界限中构成的自我。而自己选择的文化比较研究,也便于我不仅从经验也从理论层面来理解中美各自的文化界限。

“中美各自的文化界限”是个粗略的概念,因为中国人美国

人在具体的时空中都被更具体的界限构造,也在不断制造名目繁多的界限和区别。国家、民族、种族、阶级、性别、地域、宗教等等,这些在具体时空中产生的界限交错起来塑造着每个具体的人。在被前人划定的界限中生存较有安全感、稳定感。而变动的社会经济政治形态往往既使习以为常的界限显得格外不合时宜和束缚人,又可能产生维护既往界限以求稳定或巩固现存权力关系的强烈欲望,所以打破界限和维护、巩固、再制界限的斗争在历史上往往平行发生并绵延不断。

过去一个多世纪里,在全球各地最明显和最大规模的“越界”是女人的越界。生产方式的变迁和全球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动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各类男女的生存状态,由宗教、法律、习俗、政权、婚姻制度、劳动分工等等社会体制维持的男权文化对女人的界定和限制受到了全球各地女权主义者的挑战和冲击。她们不仅身体力行地突破男权文化对性别的限制,也力图跨越国家、民族、种族、阶级等种种在男权文化中建构起来的等级界限,并在这样的实践中寻求跨越地域文化差异的全球联盟,如世界妇女大会所生动地展示的那样。当资本主义全球化使资本和资本主义价值观跨越国界在世界各地巩固和复制各种等级制时,全球各地女权主义跨文化跨国界的抵抗行动正日益壮大。“跨文化女权实践”是“全球化”过程中一个重要方面,以此为题不仅是为了说明笔者活动的实质,更是为了引起国内读者对这一女权主义“全球化”的关注。

女权主义的越界行动表达的是人对自己生存处境的一种新的觉悟,这种觉悟却并非天然根植于女人的生殖器官。无论何

种性别的人都可以通过学习获得对外界和对自我的新的认识。但是因为女权主义的“越界”历史追求表达的是对公正、正义理念的追求,是对各种享有特权的阶层及其所制定的规范和意识形态的尖锐批判,她使许多在现存界限和等级秩序中的既得利益者感到不安,甚至反感或视为异己。作为一种来自边缘的挑战力量,她被男权中心的主流社会文化排斥完全不足为奇。男权主流社会对女权主义的排斥是发展女权主义的必要性的反证。主流社会政治文化对女权主义的吸纳接受或排斥拒绝程度是检测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公正程度的有效指标。

这本文集记录了过去十多年我寻求了解文化界限,并以女权主义的视野跨越界限的部分思考和行动。因为大部分时间在美国工作,我的身份在国内一般被界定为“海外学者”,但这个“海”不仅无数次地被跨越,在我每天大量的网上工作时间里更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概念。确实,互联网为跨文化女权实践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不过,跨越国界的便利并没有减少突破男权文化界限的艰难。那些界限和准则长久以来甚至被女性自己也内化为自我的组成部分,更被全球化资本主义披上一层“现代化”的外衣,因此即使在意识层面上认同女权主义理念的人(包括本人),在无意识层面上依然会有种种不适或困惑,往往难以清醒地识别哪些是必须跨越的界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女权越界行动是重构自我的一种努力,是一种未完成状态。

当然,女权主义的越界实践目标不仅是自我完善,更是改造社会,这样的实践不可能仅是一种个体行动。在过去十多年里,我非常幸运地结识了国内外诸多女学者和活动分子,并和她们

一起从事了一些推进女权主义学术发展的工作。文集上的许多思考都来自这些集体实践活动,有的文稿也是这类实践的记录。如第1篇所展示的,我对女权主义的认识是在中国和美国参与各种实践活动,包括学术活动中不断深化的,而认识的变化则是新的越界行动的基础。这本文集除了第1篇,其余各篇基本按写作时间顺序编排,便于读者较明晰地看到我的实践和认识的变化。文集中第7篇至第12篇都是基于我在国内一些高校的讲课和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录音整理而成的,在此一并感谢各位师生精心的文字转录工作。

自1999年以来,我和国内许多高校女学者一起开展了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的课程发展工作,试图通过高等教育中的课程改革创新,在中国把妇女与社会性别学作为一门学科建立起来,这是跨越知识生产领域中的社会性别界限的必要步骤。这个步骤本身又涉及到跨越传统学科的界限和知识生产体制的种种界限。作为一个往返于中美学界的中国女权主义历史学者,我清醒地看到,此刻若不突破这些界限,中国的知识生产在21世纪将继续复制男权文化和等级结构,从而继续扩大而不是缩小中国现存的各种等级差异,也会扩大中国知识界与国际知识界在认知结构上的差异。改造知识生产是女权主义学者的重大历史责任,我衷心希望有大批年轻学者积极参与行动,让我们共同努力通过重构知识体系来开创属于21世纪的新文化。

谨以此文集献给正在和将要从事女权主义学术发展的同行们。

王 政

2004年2月于密歇根

目 录

前言/1

心智的选择/1

“女性意识”、“社会性别意识”辨异

——对当代中国女权主义思潮的一个分析/25

《社会性别研究选译》序/53

当代中国妇女研究/65

浅议社会性别学在中国的发展/92

孔雀舞与社会性别/115

高等教育中的妇女学中美比较

——在“社会性别与教育”读书研讨班上的发言/120

突破单一的“地位”分析框架/157

社会性别与中国现代性/174

关于 gender 的翻译/183

妇女学的全球化与“本土化”/193

面对女权主义学术/208

心智的选择

1983 到 1984 学年,我参加了美国福布莱特文化交流项目在
上海外国语学院办的高校师资培训班,专修美国史。第二学期
美国教授布置大家各自选题做篇结业论文。我的选题是“美国
的职业妇女”,至今我也不太明白当初怎么会选这个题目的。在
这之前,我从未写过关于妇女的文章,思考问题时也很少想到自
己是个女性。当时交往的朋友中男性多于女性,常爱同男性朋
友们就时事、政治、文学等不涉及妇女的话题海阔天空神聊。那
位美国教授是传统的男性学者,也没在课上讲过美国妇女。全
班十几位同学,只有我选了关于妇女的题目。今天细想起来,我
当时对美国同类的兴趣一定同自己的潜意识相关。

论文怎么写的,今天已毫无记忆。因为学期中母亲去世,对
我打击非常大。今天的记忆中只有围绕母亲去世的一切细节历
历在目。提这篇已经忘却的论文是因为它竟然是我人生转折的
一个标志。同班同学中有一位是武汉大学教师,他得知我选了
妇女题目后,便找我谈,说美国史学会的秘书长刘绪贻教授在编
一套美国史丛书,想找一位学者写美国当代妇女运动,问我是否

有兴趣。我当然受宠若惊,因为以前从未写过书,美国史也刚开始学,一下子就有人约稿,自然立即答应下来。这期间我正在申请赴美留学,那位同学也认为我去美国后,搜集资料就方便了,写这本书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1985年,我被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历史系录取,成为美国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因为有写作任务在身,我要求一位美国妇女史教授做我的导师,我的研究领域便也是妇女史。当时的选择完全是出于实用性的考虑,压根儿没想过我要做妇女史学者。在那一阶段,自己兴趣最浓的是文化比较研究,选了不少这方面的课,后来还获得了学校里跨学科的“社会理论和比较历史”课程的结业证书。

可我那位美国妇女史教授罗森把我当做她第一个学妇女史专业的外国留学生认真对待,手把手地教。当她得知我想在学习期间完成一部美国当代妇女运动史时,更是热情地帮我组织座谈会,推荐书目,介绍我参加各种妇女活动,目的是让我身临其境地了解美国妇女运动。在初期的所有活动中,我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去参加的,只是出于好奇去了解。我也经常被邀请在各种场合介绍中国妇女的情况,我总是毫不犹豫地讲中国妇女在社会主义中国所享受到的男女平等。走出国门的中国人常常会无意识地扮演无冕大使的角色,我到处宣传中国妇女的社会进步主要倒不是出于民族主义,而是真心认为自己是个解放了的中国妇女,并且相信中国妇女的解放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实现的。在美国妇女史课上了解到的美国妇女受歧视的历史和现实更使我对自己作为被解放了的中国妇

女的优越地位感到自豪。“怪不得她们要搞女权运动呢！她们遭遇不平等的事太多了！”我心里常常这样感慨。有一天妇女史课上几个美国女同学在激动地讲述什么，原来是学校里有一帮学生为了挣钱，搞了部 X 级的黄色片子来放。学校里的妇女组织很气愤，决定晚上在电影院前搞抗议活动。我问是什么样的黄色电影，因为我从来没看过黄色电影，对此没概念。罗森教授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你搞美国妇女研究，你一定要了解什么是黄色电影。我建议你去看一下这部电影。”我那时很穷，学校里放电影虽然只要两美元一张票，一般我也不舍得去看。这次为了研究了解，决定去看一场。

那是一次难忘的经历。我完全被大银幕上赤裸裸地表现的对女性肆无忌惮的污辱所震惊。更令我无法容忍的是剧院里一些男学生每每在有污辱女性的场面时起哄。我觉得简直像自己被一群流氓所包围，遭到强暴，那种深深的屈辱感是我从未体验过的。我不断提醒自己是干什么来的，坚持到电影结束。我冲出电影院，跑回住处，一进门就向我的美国女友大声嚷道：“你们如果不禁止这种东西，你们美国妇女永远不可能获得解放！”说完冲进自己的卧室大哭起来，让眼泪冲洗满胸的屈辱与愤懑。

我显然认为自己处于比美国妇女优越的境地。我的人生经历确实很顺利，在家是受到父母宠爱的小女儿，上学工作也从没有因为自己是个女的而受到歧视。相反，有好几次因为是个女的而获得男性所没有的“优待”，比如在农场时被挑选去广州交易会当讲解员，被挑选去主演一部电影等等。当然，那时我从来不把自己的机遇同性别相连，因为我坚信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

办到的,女同志也能办到。我们农场在两万多名职工中发展新党员,第一批四个人中就有我,当时我才 18 岁。1977 年恢复高考,我以初中二年级的学历考上大学。在大学里又被评为市“三好”学生,优秀党员,也是校学生会副主席,毕业后又被留校当教师。在我看来,我的人生就是中国妇女翻身解放的写照,尤其是在同我母亲的强烈对比之下,我更感到中国妇女的进步巨大。我母亲是裹过小脚的文盲,包办婚姻嫁给我父亲,生了 9 个孩子,操持家务一辈子。

因为认为中国妇女已经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获得了解放,我在美国妇女史课上或参加美国妇女的活动时常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心态。“她们的路还长着呢,连产假还没有呢。”在当时的我看来她们的历史与现状都跟我们很不同,她们的女权运动对我、对我们国家都没什么关系。比如美国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从 19 世纪到 20 世纪初持续了 70 年,而我从来没为选举权操过什么心,那个权利在中国宪法中是早为妇女规定了的,但也不意味着什么。两个国家政治制度、文化观念相差太大,难以借鉴。我当时给自己设立的目标是在自己将要写的书里尽可能忠实地反映美国女权主义的历史和现状,使国人能跨越文化地、而又设身处地地感受美国妇女的状况,多一分了解,少一点误会,仅此而已。

当然我也经常为历史上和现实中美国女权主义者们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所感动。1986 年春美国各地妇女组织联合起来在全国几个大城市同时进行示威游行,维护妇女的堕胎权。我们学校的女权组织也联系了好几辆大客车,把参加示威游行的志愿者运送到洛杉矶。一位女权主义男教授是我的朋友,通知

了我这一活动,我便同他一起上了路。汽车从戴维斯开到洛杉矶要八个多小时。我们是周五晚上出发,在车上睡一夜,第二天一早抵达,便参加游行。那天有几万人从西部各地涌到洛杉矶参加游行,男女老少以及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都有,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举着自己准备的标语、横幅、小旗,呼喊口号唱着歌,井然有序地在警察划出的街道上行进着。突然天下起了倾盆大雨,许多游行没有带雨具,但没人离开队伍到屋檐下避雨,大家继续精神抖擞地向前走。

我也在雨中走着,不过打着我哥哥为我准备的伞。我心中既感动又惭愧,因为参加这次游行一是出于好奇,但主要是借机来洛杉矶同在此做访问学者的哥哥会个面。免费坐车来洛杉矶一趟,对我这个中国穷留学生来说是机会难得。在这之前,我在中国倒是参加过多次游行,但那都是学校或单位组织的,决不是因为自己认同了什么主义或原则,为了发出自己的呼声,实现一群人的理念,维护一个群体的利益,而不计得失地自发行动。我看着那些淋在雨中的普普通通的美国人,我觉得她(他)们每一个人都很美,因为她(他)们每个人都洋溢着那种追求理想的独立的人的精神之美。

晚上夜车返回。头天在车上过夜,接着是淋雨游行,我已经觉得疲惫了,但同车的美国人(大部分是女学生)却兴致勃勃地唱起歌来。在一位音色非常优美的女学生的带领下,她们唱起了一首又一首民权运动中流行的歌曲。“我们将克服一切困难。我们是战无不胜的。”那歌声传出了她们美好的理想,表达了她们坚定的信念。那歌声伴随着车身有节奏的晃动触动了我的心

灵。我在美国史课上放的历史记录片和历史书中熟悉了这些在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和女权运动中流传深远的歌曲,这是那一代美国人追求平等正义的理想精神的写照,现在由身边20来岁的女学生咏唱着,使我一下子把许多激动人心的历史画面和今天的现实联系起来,清楚地看到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理念和议题还在继续着,不仅中老年在继续为实现平等正义努力,年轻一代也踊跃地加入了这个行列。我被这些乐观地为理想而奋斗的美国人所深深吸引。

美国妇女史的课越修越多,与修美国妇女史的研究生们也日益熟悉起来。闲时大家聊天,美国同学爱听我讲上海的生活。有一次我讲述了在上海坐电车遭遇扒手的经历:我下车时感到有人碰了一下我的口袋,我下了车一摸,皮夹子没有了,车门尚未关,我转身又跳上了车,指着那个碰我口袋的男人让他把我的皮夹子交出来。那男人慌张地否认,我看见他已把我的皮夹子丢在地上,便拣了起来,在他面前挥了一下,说:“就是你偷的!”然后下了车。美国女同学们听了高兴地笑起来,说:“你好勇敢!”我说:“那怕什么!那么多人,他敢把我怎样!”过了些日子,又和这些同学聊起上海的事,不知怎的又讲到坐公共汽车的经历,这回讲的是女人坐汽车不可避免的气恼事:在拥挤的汽车上经常会下流的男人触摸。同学麦凯听到这儿,瞪大了眼问:“那你是怎么对付这种情况的?”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有什么办法,只好躲避开呗!”麦凯追问道:“为什么你抓小偷那么勇敢,面对这种人却要躲避?”这个尖锐的问题使我一下子语塞,我想了一下,解释道:“在车上揭露这种人的话,人家都会看我,反而会

觉得是我不知羞耻,我会非常窘迫的。”我知道自己的回答很有问题。果然麦凯又严肃地发问:“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你觉得这种情况正常吗?妇女就应该忍受这种状况吗?”她的连珠炮发问和她含着责备的眼神使我哑口无言。

麦凯是我所遇到的第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正面严肃地质疑我的美国女权主义者,她一定不知道正是她率直的批评性的发问使我开始了对自己的反省。我突然意识到我并不如自己想像的那么解放。我从来没有想到把那种令我胆怯想要逃避的场合同妇女解放的议题相连,当然更没有去理性地分析这种状况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别关系和特定社会文化对女性的规范。在我所熟悉的中国妇女解放理论中,妇女解放是以女性在社会领域中的参与程度来界定的,这套理论没有涵盖女人生活的每一个场所。而在我简单幼稚的思维方式中,那些没有涵盖的部分似乎与妇女解放无关,也从没意识到那里尚存在许多问题,尽管我体验过女人的烦恼、目睹过女人的苦难。麦凯的问题使我悟到美国女权主义关注的一些议题同我的生活也有关系。女性在公共汽车上的遭遇可以毫不勉强地被界定为“性骚扰”,而以前我总认为这个美国女权主义发明的词只是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的困境。

麦凯的提问不仅使我看到社会主义中国也有“性骚扰”,更重要的是使我体会到女权主义批判性思维方式的力量。为什么在她提出那个尖锐问题之前,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上的矛盾以及这矛盾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因为我像千千万万中国妇女一样,把社会对女性的规范作为天经地义来接受了,更确切地

说,我缺乏分析社会文化对男女行为界定和规范的任何范畴、概念、语言,仅仅是信奉男女平等显然并不足以使我有识别不平等的火眼金睛。麦凯能在我习以为常的事情中敏锐地看出问题是因为她具有女权主义的基本概念和观察角度。与麦凯相比,我这个“解放了”的中国女性显然还有不少盲目性,对自身及所处环境的认识还很肤浅。

麦凯提问引起的反思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妇女史课上,在阅读中,在与老师和同学的交谈时,在听演讲、参加妇女组织的会议等等一系列活动中,我不再以旁观者的心态把看到的听到的归入“她们的经历”,而是会深入地想一下她们对事物的分析与我个人和中国妇女的经历有没有关系。当我调整了居高临下的心态以后,我发现尽管美国女权主义者关注的有些议题(比如堕胎权)与我的生活经历相差很大,但她们对事物的分析确实令人耳目一新,常常激发起我对问题的新思考。我的学习不再是仅仅为了写一本书,而是为了弄懂许多我从未思考过的问题。在课堂上,在阅读中,我经常体验到火花在黑暗中一闪,豁然开朗的快感。在一次一次的思维快感中我逐渐转换了自己思考问题的角度,对事物产生了以往所没有的认知。

记得第一次学到“内化”理论时,我不由地审视起自己到底“内化”了多少男性中心社会的价值观,以及这个“内化”过程是如何得以实现的。借鉴美国妇女史课上对维多利亚时代性观念及其对女性束缚的分析批判,我很容易地看到了自己恪守的贞操观是男权社会的价值观。那么这个价值观怎么会被我内化到近乎本能的地步的呢?我在记忆的隧洞中搜索着,以前从未回

味过的一些生活片段从脑海中浮现,在我新的眼光中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小时候我们弄堂里有个举止优雅容貌秀丽的高中女生,我从没有和她说过话,但在心里很喜爱这个姣好的少女。在我八九岁的时候,她突然成了全弄堂关注的中心人物,她在辅导一个成绩差的男同学时,同他发生了关系并有了身孕。这件事是我童年所知道的最大的“丑闻”,弄堂里的女人们在背后对她的指指点点、窃窃私语清楚地告诉我她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她的报应是必须嫁给那个使她怀孕的男的,尽管人人都说那个“小坏料”同她不配。她果然很快同那个男的结婚了。出嫁那天,她打扮得像别的新娘一样的喜庆,不同的是她握着一条小手绢,不停地擦着止不住的泪水,在女人们小孩们各种眼神的凝视中缓缓地、悲哀地走出了弄堂,就像是去赴一个葬礼。那个婚姻确实葬送了她少女时代常有的愉悦欢快神情,婚后不久,那个男的便开始打她,弄堂里常可以听见她的哭嚎声。目睹着她所经历的耻辱与苦难,我心里非常难受,但我并没有向大人发问:为什么她怀了孕就要受人鄙弃?就一定得和那个同她不配的男的结婚?成年人将失去贞操的女人打入另类并把这种做法看做天经地义般的自然合理,在那个幼小的年纪,我也悄然无声地接受了这个天经地义,把那少女的未婚先孕当做她堕入苦难深渊的根本原因。整个事件通过大人的叙述在我的眼睛里被个人化了,少女“咎由自取”、“一失足成千古恨”,我长大了只有“洁身自好”才能免此厄运。

那是一个强有力的内化过程,不需要任何人专门为我开设性道德课,童年的我已经深深地领会了社会对女性的性藩篱界